

政學先生

李村 著

王世杰的“学者外交”
再谈王世杰的“学者外交”
王世杰与北大派
王世杰的自白
胡适的“双重身份”
胡适与蒋介石
胡适晚年的困境：胡适与雷震
再说胡适与第三党问题
奇人龚德柏
学人王芃生
左舜生的另一面
一世书生常乃惠
南京和谈中的梁漱溟
背信弃义的张君勱
失望的罗隆基
钱端升的转变
蔡元培的“治术”
胡适与傅斯年
顾颉刚与童书业
夏承焘与任铭善
龚德柏与王芃生
从中央政校看“党化教育”的失败
《中苏友好条约》与金圆券
谁愚弄了蒋介石
再说早期留美学生之“兄弟会”

李村 著

政學先生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学先生 / 李村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10
ISBN 978-7-108-05442-5

I. ①政… II. ①李…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1962 号

策划编辑 刘 靖

责任编辑 鲍 淮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1

字 数 276 千字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目 录

王世杰的“学者外交”	1
再谈王世杰的“学者外交”	13
王世杰与北大派	26
王世杰的自白	39
胡适的“双重身份”	44
胡适与蒋介石	60
胡适晚年的困境：胡适与雷震	78
再说胡适与第三党问题	102
奇人龚德柏	109
学人王芑生	135
左舜生的另一面	156
一世书生常乃惠	170
南京和谈中的梁漱溟	181
背信弃义的张君勱	195
失望的罗隆基	209
钱端升的转变	217
蔡元培的“治术”	227

胡适与傅斯年……234

顾颉刚与童书业……243

夏承焘与任铭善……260

龚德柏与王芑生……274

从中央政校看“党化教育”的失败……287

《中苏友好条约》与金圆券……300

谁愚弄了蒋介石……312

再说早期留美学生之“兄弟会”……320

后 记……329

王世杰的“学者外交”

王世杰是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早年留学英、法，1920年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翌年初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法律系主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9年3月，他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1933年4月经胡适（另说为顾孟余）举荐，出任汪精卫政府教育部长。不料抗战爆发后，他刚刚结束各大学的内迁工作，开始对战时教育实施规划与调整，1937年12月行政院改组，他竟遭到国民党元老派的反对，被解除了教育部长职务。

他这次被解除职务，显然是从政道路上的严重挫折。然而挫折也带来了机遇。次年5月，朱家骅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他又接替朱家骅的职位，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从此很快获得蒋介石的信任，成为蒋介石在外交事务上的核心幕僚。不久，又兼任国民党宣传部长，三青团干事长，在政学系中举足轻重。

军委会参事室是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由熊式辉规划设立的¹，下设政治、经济、外交、教育文化四个小组，其中以外交为首要。名义上是“最高幕僚组织”，号称“智囊团”，实际上只是一个清议机构，地位尊而不要。参事的工作只是“沟通下情，向当局建议”，平时连接时办公都不用。他以一

1 熊式辉：《海桑集》，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年版，第268页。

介书生，凭借一职清要的地位，能够获得蒋介石的信任，成为蒋介石的入幕之宾，主要是靠心思细密，了解国际形势，熟悉欧洲的政治与政情。以张忠绂的说法，王世杰“虽非素习国际外交者”，但是自执掌参事室后，经常“不耻下问”，“就他所知的情报”与下属商量讨论，不久便进入角色，对国际形势有了深入了解，可以就时局变化随时向蒋介石提供意见，纠正蒋介石在对外发言上的不当。1942年10月，顾维钧在回国述职时，拜访了所有中枢政要，发现王世杰对国际局势的了解，“远胜过其他政府首脑”¹。1940年以后，蒋介石对外发言的文稿，大部分都是由王世杰起草的。

从《王世杰日记》中看，他早在任教育部长时，便关心政府的外交事务，对外交部的工作极为不满，认为外交部头脑僵化，不知进取，“对于一切问题，均缺乏准备，其行动均缺乏自动精神”²，因循守旧于北洋政府时代，经常在国防最高会议上与外交部长王宠惠发生争执。据王宠惠说，他做外交部长时遇到的最大困难，并非来自“最高当局”，而是“来自于王世杰”。在每周的外交例会上，他每次就外交问题发表意见，“一定要遭到王世杰的评论与批评”³。后来甚至发展到“外交部处理的任何一项问题”，王世杰都看不顺眼，“都要向委员长提出建议”⁴。因此当王世杰获得蒋介石的信任，介入政府的外交事务后，政府的外交路线也发生变化，逐渐脱离了“职业外交”的轨道，出现“学者外交”的倾向。

这种所谓“学者化”的外交，首先表现在用人上。

王世杰认为中国自清末以来，在外交上之所以屡屡失败，割地赔款，受尽了屈辱，主要是外交人才严重落后，从事外交事务者，不是“媚外”便是“昧外”⁵；这种状况延续下来，使外交部现任官员和驻外使节中，除

1 《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4页。

2 《王世杰日记》第1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0年版，第191页。

3 《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第603页。

4 同上。

5 《武汉大学周刊》第112期。

了郭泰祺和顾维钧之外，“思想细密者甚少”¹，很难积极进取，使外交局面有所改观。这也使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长期缺乏了解，以至于在西安事变之前，美国一直认为蒋介石只是一般的军阀，中美关系也始终较为疏远。他接任参事室主任后，便一再介入外交部的人事安排，利用各种机会向蒋介石推荐人才。当时他最看重的外交人才，有胡适、郭泰祺、周鲠生、钱端升、罗家伦、杭立武等人。郭泰祺出任外交部长、胡适出任驻美大使、杭立武担任对英外交联络人，他都起了关键作用。

依照钱昌照的说法，蒋介石派胡适去英、美“做国际宣传”，主要是为了保全胡适的名誉，免遭孙科、居正等人的挞伐²，但是1938年7月，王正廷因为在对美借款上遭人欺诈，“耗费巨款，毫无成效”，遭到了国内各方的指责，王世杰立刻抓住这个机会，通过周鲠生，在“向蒋介石提供外交方略时”“力言关于对美外交，应调整使节”³，建议由胡适接任驻美大使。理由是，今天的外交官已经与以往不同，不再需要那种擅于辞令、虚与委蛇的宫廷式人物，经过民主政治的洗礼，20世纪的外交家应当平易近人、受当地人民爱戴，所以最好由知名学者担任，而胡适“正是这种理想人物”⁴。为了让胡适顺利接任驻美大使，他还几次请陈布雷出面，要蒋介石催促孔祥熙，将王正廷“毅然撤回，勿使再误国事”，将“胡适使美一事在一星期内发表”⁵。同时草拟了一份节略，“规划对美外交工作”，准备请蒋介石阅后，“交由外交部电达新任美使胡适之”⁶。

钱端升以留学美国，学习欧美政治出身，也是王世杰最看重的外交人才之一。他在任教育部长时，听说朱家骅可能出任驻德大使，便曾向朱建议

1 《王世杰日记》第6册，第8页。

2 《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页。

3 《王世杰日记》第1册，第317页。

4 张忠绶：《迷惘集》，台湾双子星出版社1971年版，第90页。

5 《王世杰日记》第1册，第385页。

6 同上书，第379页。

“在英、德、法各设一永久性质之机关，以统一宣传工作，并提议请钱端升主其事”¹。之后，又将钱端升介绍给蒋介石，派钱端升作胡适的助手，去欧美从事宣传活动。他接任参事室主任后，对钱端升更是竭力提拔，先是托付陈布雷，为钱端升“另为设法”²，将钱端升留在重庆任职。继而又让郭泰祺出面，推荐钱端升任外交部次长。两案不成后，他又给钱端升提供经费，主编《今日评论》杂志，评论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为钱端升从政创造条件。钱端升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他还多次派钱端升出席太平洋学会会议，从事所谓“学术外交”和“民间外交”。1943年11月，他率团出访英国时，途中发现美国的新闻媒体受保守势力影响，出现了许多对中国不利的报道，而国民党在北美的宣传机构CNS却听之任之，没有做出及时反应，又打电报给蒋介石，要蒋介石“考虑加派钱端升君来美”³，加强对英、美的宣传工作。

王世杰的“学者外交”，还表现在外交政策上。他对王宠惠的不满，主要是认为王宠惠颀预迟钝，“其一切动作，纯属被动，无一贯的负责的政策”，对国际局势不能及时应变，更谈不上未雨绸缪，致使“抗战一年有余，对外联络乃至贷款等事，毫无所成”⁴。王世杰出任参事室主任后，首先试图改变的，就是这种因循保守、“毫无热力”的状态，每隔几天便起草一份节略，向蒋介石献计献策。

王世杰接任参事室主任时，欧洲战事已经开启肇端。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意大利也蠢蠢欲动，图谋吞并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故他上任后不久，便两次上书蒋介石，要蒋介石提醒外交部注意两件事，一是“英国终或承认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我国对于此事应早定应付方案”；二是“日本如果对华宣战，我之对策应如何？”⁵他还几次让张忠绂“起草上委

1 《王世杰日记》第1册，第178页。

2 《胡适来往书信集》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81页。

3 《王世杰日记》第4册，第262页。

4 《王世杰日记》第1册，第393页。

5 同上书，第201页。

座的意见书”，说明“欧战将起，中国应谋如何应对”¹。不久，他听说孙科、蒋百里对外宣称，“欧洲发生战事，于我极为有利”，又极不以为然，“力向蒋先生言，此说殊不可信”，认为“欧战发生后，中日问题将来能否在结束欧战之议和会中解决尚属疑问，即令在该会中解决，其解决亦不必于我有利，巴黎和会之往事可为殷鉴”。他甚至认为欧战爆发后，日本很可能“以无须顾忌英、俄之故”，对中国大打出手，“一面断我海上交通，一面增兵三十万攻我”，在三五个月内，即“可制我死命”²。所以“欧洲和平之维持，于我较为有利”，一旦欧战爆发，中国立刻有亡国的危险。故于几天后，又向蒋介石上了一份节略，建议蒋介石料敌为先，考虑运用国联盟约第十六条条款，“以为预防或抵制日本对华宣战时封锁或进攻华南之一种武器”³。

德国进攻波兰，欧战全面爆发后，王世杰又立即催促蒋介石“商对欧战方针”。他对欧战的态度最初与蒋介石一样，主张“先发制人”，首先对德宣战。但经过考虑后，担心“中国对德宣战后，苏联对华之物质援助，是否受影响”，又退而改为向国联提交一项议案，“要求国联制裁侵略”，同时召回驻德大使陈介。王世杰提出这项主张，除了要表示中国的反侵略立场，主张公理与正义之外，主要是为了向英、法示好，以免英、法两国为了应付对德作战，对日本采取妥协合作的态度。而他的这项主张，遭到了孔祥熙、王宠惠、张群等人的反对，认为在目前的事态下“不必即有表示，尤反对为显明之表示”。因为以中国的国力，自顾不暇，贸然提出“道义上的援助”，弄不好反会自取其辱。孔祥熙还指示王宠惠取消前议，撤销召回驻德大使的电令。王世杰得知后非常不满，立刻去找王宠惠，“力斥其态度之不定，举措之失当”⁴，并再次催促蒋介石对欧战表态，立即召

1 张忠绂：《迷惘集》，第103页。

2 《王世杰日记》第1册，第387页。

3 同上书，第391页。

4 《王世杰日记》第2册，第147页。

回驻德大使。¹

但是王世杰这些“学者外交”举措，往往不尽如人意，经常因为用人不明，行事不当，造成许多不良后果。就用人而言，郭泰祺任外交部长不久，蒋介石便对郭的表现极为不满，不断在日记中指责郭泰祺“不忠于职，任意贻误”，“毫无志气，不知责任，更无国家观念，惟以私利权位为谋”，对于外交“之无常识，与其官僚成性，毫无活气，区区说帖拟稿至五小时尚杂乱不清，令人为之脑痛气闷”。有时甚至迁怒于王世杰，说：“外交人员之无能无学，与郭部长之官僚习气，以及王雪艇之小见私心，更令人烦闷痛苦。”²

而其社会观感尤其恶劣。1941年12月，王芸生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文章，题为《拥护修明政治》，以不点名的方式，历数郭泰祺的各项外交失误，还揭露他生活腐化，在国难当头之际，每到周末下午，便同一位从英国带回来的情人窦小姐（窦学谦）去黄山沐浴；他还以65万元的公款购买了一座公馆，用以金屋藏娇，每天学韩寿偷香，张敞画眉，“戏谑之声达于户外”，其“私行之不检，不堪揭举”³。蒋介石见到报纸后，次日便在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上，要孙科当众宣布免除郭泰祺外交部长职务，令他当场呆若木鸡。蒋介石事后余怒未消，在日记中说：“外交部长郭泰祺免职，是为平生用人不可操切之一大教训，此人真是小人之尤者，永不能有改变气质之望，于此免职之令，实为余平生最得安心之一事。”⁴

胡适出任驻美大使后，也一再饱受非议，在国民参政会上还曾遭人质

1 从蒋介石日记中看，蒋介石在对德外交上，观点与孔祥熙、王世杰两方都不同。他曾在1941年1月16日的“反省录”中说：“余对德国外交，本来友好精神为主，自德倭防共协定发表与德承认伪满之时，余仍不赞成与德绝交，或撤退我驻德大使。——国际局势变化莫测，应静观以待其定，再决对外方针，犹未为晚。”

2 蒋介石日记，1941年11月至12月。

3 李铁铮：《我所知道的郭泰祺》，《文史资料选辑》第78辑。

4 蒋介石日记，1941年12月29日。

问。客观地说，胡适在驻美大使任上并非一无是处，他一年行两万里，演讲百余次，的确拉近了中美两国的距离，增进了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同情与了解。他的学识与人品也给许多美国人留下良好印象。但是他在上任之前，便给自己定了一条原则，对美国人“不恃不求”，实行“四不主义”：“不谈借款，不谈军援，不搞募捐，不做宣传。”以他这种立场，只适合从事民间外交和学术交流，而无法担当政府的对外使节，使政府在美援问题上尽快取得进展。正如宋子文所说，“欲其切实援助，非空文宣传所能奏效，务面向各政要及各界不断活动”¹。

所以胡适上任不久，蒋介石便对他的表现“特起忿懣，不可抑止”，为之“脑痛气闷”，认为胡适实与一般政客无异，“无胆无能，而不愿为国家略费心神，凡事只听其成败，是诚可痛可悲之至也”²，决定另派宋子文去华盛顿，直接与美国政府接触，商谈经济与军事援助问题。胡适在离任的前一个月，曾写信给王世杰，说他“数月来未接政府一电”³，可见他的驻美大使一职早就有名无实，被蒋介石废置了。

至于王世杰对钱端升的信任、倚重，更是识人不明。钱端升虽然学问很好，在教育界享有盛名，两人曾合作过《比较宪法》一书，但是钱平时为人高傲，趾高气扬，“总是过分勇于自信，目空一切”，令“许多人抱敬而远之的态度”⁴。以他这种性格根本不适合从政，更不适合代表政府从事外交活动。而且他在政治立场上也与政府相去甚远。据浦薛凤说，钱端升早在抗战前，便好谈民主、宪政一类时调，抗战期间兼任政府职务时，“依旧拉唱自由主义”，对于“对内对外重要问题”，皆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因此他在接受政府指派，从事民间外交、学术外交时，经常违背政府立场，

1 宋子文致蒋介石寒电，《战时外交》（一），《中美关系》，国民党党史会1981年版，第99页。

2 蒋介石日记，1941年12月6日。

3 《王世杰日记》第3册，第323页。

4 浦薛凤：《太虚空里一游尘》，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63页。

大唱反调，发表与政府不同的主张。

例如1942年11月，政府派钱去加拿大参加太平洋学会会议，原本希望他能代表政府阐明立场，说明中国军队在缅甸战场上的失败，英国政府要负主要责任。英军在战役开始不久，便一方面谎称自己在坚守阵地，一方面急于撤出战场，诱骗中国军队孤军深入缅南，掩护自己撤退，致使“我军被欺受诈，为其牺牲，而且仍在缅境被围，未脱险境”¹，蒙受了重大损失。但是钱端升却在会上表示，这是中国政府的一面之词，“就缅甸局势而言，中国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他还特别指出，“在缅甸战役中，中国第六军的表现也不好。他们用在当地征用的汽车做买卖，甚至还以一些缅甸僧侣充当日本第五纵队为理由，焚烧了一些缅甸寺庙”²。使出席会议的外国学者都对中国政府留下了恶劣的印象。

了解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在抗战期间，中英关系始终不好。两国名义上是盟国，实际却貌合神离，彼此嫌恶，相互指责对方无能。特别是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后，蒋介石对英国人更加不满，认为英国人诡计多端，损人利己，卑鄙下流。³在日记中不称英国人为“英人”，而称“英豨”，发誓今后“不可共事也”⁴。但是两国关系的恶化，在国民政府是极不明智的。这不仅会破坏两国间的同盟关系，也会伤害中美关系，最终影响中国的战后利益与国际地位。是以外交部门从大局出发，一直在两国政府与民间做沟通、疏导工作，以减少彼此间的成见。1943年11月，王世杰还以国民党中央宣部长的身份，组织一个代表团访问英国，自任团长，目的就在“增进英人对华之了解”，造成友好空气，为中英合作增加便利⁵；而原定的代表团成员名单中，就有钱端升。想不到据叶公超说，钱端升却倒行逆施，写

1 蒋介石日记，1942年5月12日。

2 《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第116页。

3 蒋介石日记，1942年4月26日。

4 蒋介石日记，1942年5月12—13日。

5 《王世杰日记》第4册，第182页。

信给英国联合援华委员会主席克里浦斯，说“国民党和中国军人都是反英的”，甚至“还给首相和政府其他人写信，批评重庆政府”¹。宋子文也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提及此事，谓：“少川言，克里浦斯告彼，钱端升分函丘相与重要阁员及本人，谈中国政局：一、国民党专制；二、党外优秀分子，无法参加政府；三、经济状况危急，弊端百出，政府要人亦通同舞弊。”²蒋介石不同意钱端升参加访英团，将他从名单中删除，显然与这件事有关。

王世杰在识人、用人上如此，处理外交事务也免不了书生气。他以法学家出身，思维周致，“头脑细密”。在判断外交人才时，也习惯将头脑是否“细密”作为首要项目。但是处理外交事务光靠“头脑细密”远远不够，还必须有一定的实务经验，否则，很可能纸上谈兵，最终适得其反。以欧战爆发后，政府是否应对德宣战一事为例，就可见他在这件事上的自以为是，不切实际。从《顾维钧回忆录》中看，当时因为兹事体大，政府为了慎重起见，在做最后决策之前，曾致电驻法大使顾维钧和驻英大使郭泰祺，请两人先征询英、法两国的意见。

顾维钧为此拜会了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莱热的回答很坦率，他说“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想法“完全是学究式的”，中国政府“拟议提出的声明”，根本“无补于时局”。相反只会“造成一种印象”，即中国采取这种做法，“只不过是打算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把中日冲突跟欧洲的战争连在一起，从而让中国参加英、法集团”，以获得英、法的援助。可是莱热告诉顾维钧，“由于欧洲局势的严重”，现在不论英国还是法国，都必须集中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资源，“全力以赴地进行这场战争”，在欧洲战场上取得胜利，“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援助中国”，“甚至可能被迫不得不放弃远东的部分利益”。而“如果日本以武力解决相威胁时，英国和法国甚至

1 《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第343页。

2 《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页。顾维钧字“少川”。

可能向日本屈服”¹。莱热向顾维钧表示歉意，说他这些话“可能有些鲁莽，但这就是他的看法”²。

英国的态度也很冷淡。英国在中日问题上本来就持中立立场，甚至为了维护它在亚洲的领土利益，急于同日本达成妥协，根本不愿与中国走得太近。郭泰祺接到电报后，给英国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留了一份备忘录，哈里法克斯看过后，请他转告蒋介石，英国政府对他的好意表示“欣赏和感谢”，也不反对中国主动发表这项声明，但是英国政府认为，“这一声明不能改变任何现实，因为中国并无在欧洲帮助英、法的条件，中国本身也不能从中得到什么益处”³。英国与法国一样，目前必须在欧洲战场上全力以赴，“不能像过去那样继续供应那么多物质”⁴。中国人准备的“道义上的援助”，真是热脸贴了冷屁股。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有些甚至更为荒唐。例如王世杰发现抗战爆发后，苏联虽然向中国提供援助，但“不愿与日本发生直接战事”，而美国受中立法的束缚，在对华援助上又难以进展，便别出心裁，建议蒋介石与苏联接洽，“一、请其向美借款，而余则向苏借款。二、请其以大量技术军队供吾作战，而用志愿军名义”。如此异想天开，真令人哭笑不得。从以上几个例子已经可以看出，王世杰任参事室主任后，尽管自己踌躇满志，在外交事务上提出许多建议，也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但他其实对外交事务还很生疏，有些建议自以为是，实际上有害无益。而且这种情况后来就更加严重，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在旧金山会议时，建议中国代表团对安理会否决权问题提出反对意见。

所谓安理会的否决权，是指安理会通过的提案，必须经过四个常任理

1 《顾维钧回忆录》第4册，第66页。

2 同上书，第64—65页。

3 同上书，第64页。

4 同上书，第68页。

事国的一致同意，其中任何一国反对，都有一票否决权。这项条款是1944年8月，中、美、英、苏四国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讨论联合国宪章时，由苏联首先提出来的，最初英、美两国曾表示反对，后来经过讨论，一致接受了这项条款，认为这项条款符合罗斯福有关“大国政治”的构想。英、美改变立场后，曾向中国方面做过解释，认为联合国组织的成败，“取决于四个大国能否团结一致”。而这项条款，有助于大国之间的团结与合作。从“现实的立场”上说，这项条款对四个大国也很有利。如果没有这项条款，大国在国际争端中很容易受小国的利用和摆布，最后“即使不愿意，也可能被迫参战”，使大国穷于应付。¹

但是王世杰则认为，这项条款违背公平与正义原则，也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要蒋介石致电中国代表团，在这项条款上不可以“贸然附和”²。据顾维钧说，1945年3月，他去参加旧金山会议之前，王世杰又再次要求他在会议上表明立场，“当其他国家就这一提案表示反对时，中国必须响亮地说话”。顾维钧以为不妥，强调这样做很可能引起其他大国的反感，使中国失去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王世杰却坚持认为，“此点毋庸顾虑”。中国为了公平和正义，宁愿不做大国，放弃常任理事国资格，与大多数中小国家站在一起，“因为这样我们倒可以畅所欲言。我们在二等强国中当个代言人，地位倒是很硬的”³。

王世杰提出这项主张，很可能采纳了张忠绂的意见。张忠绂始终认为，在联合国的地位问题上，中国任常任理事国得不偿失，因为“否决权只有利于强国，不益于弱小。中国号称五强之一，而实力则相去悬殊”，只能被人侵略，无力侵略别人。而战后中国的心腹大患，不是别人，就是苏联，一旦苏联入侵中国，同时又在安理会上持有否决权，“很明显于中国不利”。

1 《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第415页。

2 《王世杰日记》第4册，第382页。

3 《顾维钧回忆录》第5册，第490页。

当然，中国也有权利行使否决权，“但我国既不至为侵略国”，即便握有否决权，又“于我国有何益处？”如同书生怀藏利器，只能徒招人嫉、惹祸上身而已！反不如“声明反对立场，一则可为日后留地步，一则可以争取四强以外国家的好感”¹。可见两人观点一致，英雄所见略同。只是现在回过头去看，这种自以为是的见解，真是将“学者外交”的弱点暴露到极致。

需要说明的是，王世杰接任参事室主任后，最初刚刚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在外交事务上所起的作用还很有限。从《王世杰日记》中看，抗战初期，政府采取的许多外交决策，他事先并不了解，事后也没有征求他的意见。直到抗战后期，他才真正进入政府决策的核心。他在外交部的人事任用上，更心有余而力不足，经常要找陈布雷帮忙。1945年王世杰出任外交部长，直接掌管外交事务后，才开始“以他自己的方式执行外交政策”²，全面推行“学者外交”。所以抗战结束后，北洋政府时代的外交人才便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由新一代学者人物所取代。

而这种改变，对当时的民国政府非常不利。抗战结束后，中国的内忧外患并没有解除，在处理雅尔塔密约问题上正面临巨大困难。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回忆录中说过，斯大林是他遇到的“最厉害的谈判对手”，如果以他“三十年形形色色国际会议的经验”去“挑选一个出席会议的班子”，他首选斯大林。³相比之下，中国的外交实力就很薄弱。这种对比在中苏条约的谈判上表现得十分明显。中方在谈判过程中始终处于被动，进退失据，应变无方，最终不仅丧权辱国，葬送国家利益，也直接导致了蒋介石政权的垮台。有关这一问题，留待下一篇再谈。

2013.2.18

1 张忠绖：《迷惘集》，第128页。

2 同上。

3 《艾登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898页。